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蒙古语喀喇沁土语 社会语言学研究

白玉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蒙古语喀喇沁土语 社会语言学研究

宝玉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语喀喇沁土语社会语言学研究 / 宝玉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5506 - 6

I. ①蒙… II. ①宝… III. ①蒙古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①H2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851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责任校对 郝阳洋
封面设计 肖 辉 郭蕾蕾 孙婷筠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6.75
字 数 584 千字
定 价 1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宝玉柱（包玉柱，哈斯巴根），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编审、蒙古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评审专家。在国内外刊物及出版社发表论著 110 多篇（部）。代表性专著有《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系研究》等。有论文被美国 SSCI 数据库收录，有多篇论文被 CSSCI 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收录或转载。2006 年至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子项目 1 项，985 工程子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蒙古语喀喇沁土语社会语言学研究》，于 2013 年 9 月结题，被鉴定为优秀，并入选 2014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社会语言学研究要讲究方法论

——《蒙古语喀喇沁土语社会语言学研究》读后

戴庆厦

喜读玉柱教授的又一部新著《蒙古语喀喇沁土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很有感触。语言研究一定要重视方法论问题，这一句是老生常谈，但在具体的语言研究实践中则不易做好。他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重视方法论，所以能够发掘一些新规律，解释一些未被认识的现象。这里我谈谈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几个突出之处。

一 分析具体问题，坚持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也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基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语言和社会因素的共变关系，因此必然会涉及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背景、语言使用者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所以，只有紧密结合语言的社会特点以及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接触往来，才有可能认识语言的真正面貌。这一点，作者是有创见的。

例如，作者认为“喀喇沁”一词源于职业名称——北魏时期的宿卫军“曷刺真”。“喀喇沁”作为部落和职业名称，来自元代的钦察军及哈刺赤户；“喀喇沁”作为独立、统一的部落，形成于明代；在清代，“喀喇沁”为蒙古部落名兼行政区域名称。一言以蔽之，“喀喇沁”是从历史上演变下来的，必然要继续演变下去，不同时代政治经济环境中的生存适应是其演变的基础。北魏的“曷刺真”和喀喇沁之间的关系遥远，但有明显的几条线

索纵贯其中，作者把它限于词源关系，这是一种谨慎的处理方法。元代的钦察军及哈刺赤户同喀喇沁的关系相对清楚一些，其中族源的混同，职业上的宿卫、屯田、牧业兼营和历史上的分布地域与喀喇沁部有明显的相似性。作者还对喀喇沁的氏族来源构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很多蒙古人取汉字为姓，是清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因此如果从蒙古族现有的汉姓研究蒙古族氏族部落构成，误差会很大，但是如果从蒙古族固有的氏族部落名或职业名着手研究，可靠度可能高一些。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和蒙古贞各部在历史上关系较近，因此其氏族构成有相似或相重叠的地方，也有彼此不同的地方，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喀喇沁”从北魏的宫廷侍卫军在历史动荡中变成一个部落，又从部落分裂出元代兼宿卫、牧户一身的哈刺赤军或哈刺赤户，再经过明代的进一步分裂融合，终于形成后世的喀喇沁部落，“喀喇沁”一名也就演化为蒙古部落名兼行政区域名称。这一演化过程，符合民族部落发展的一般规律。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而人民的生活是多彩多样的，所以除通史外，专业史或行业史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史在考据的利用等方面可能没有专门民族史那样精确、到位，但专业史研究如果搞好了，可以成为民族史的有益补充或参考。据我所知，玉柱教授撰写这本著作时，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重新通读二十五史，并对涉及北方民族的史料做了详尽的摘录。这是一个费力耗神的艰苦工作，但历史的眼光拓宽了作者的研究视野，这是显而易见的。

研究语言接触历史，应该重视代际间的语言变化和聚落之间的语言变化差异。语言的演变，个人的语言变化往往比代际间的语言变化更明显。在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可能是跳跃式的。作者认为，喀喇沁部落从清代到21世纪30年代，历史不到400年，前300年是蒙汉语接触时期，后100年是蒙古语经过蒙古语单语、蒙汉双语，迅速过渡到汉语单语。共时平面上的语言模式转换速度是，城镇快于乡村，子女快于父母，干部快于农民和学生，尽管演变速度有差异，但演变趋势是一致的。一种语言一旦进入濒危期，语言传承就会出现断代。该研究的一个特点是，语言演变过程分析细致入微。作者认为民族村落社会对语言的保持具有关键作用，这一点与我们对南方民族所做的调查结论是一致的，即人口较少的村寨也可以很好地保存

自己的语言社会。

二 对影响语言演变社会因素进行多角度分析

语言演变是一个社会复杂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语言演变的特定阶段,有可能是一种或一组变量占主导地位。作者认为,影响语言转换速度的关键因素是民族接触模式,尤其是居住模式,其中,部落所处地理环境和村落具有重要意义;语言使用场域是影响语言使用模式转换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在喀喇沁蒙汉杂居区,家庭是母语的激励源,社会是汉语的激励源。社区人员的实际语言能力,在一般情况下,接近两种语言使用率的折中值。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会影响语用模式的转换;职业对语言使用模式变化也有一定影响,汉语使用程度最高的是干部,其次是家长,教师最低。家庭语言中的年龄、等级和性别约束随场景发生变化,社会语言环境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父亲和晚辈语言应用模式上,然后波及祖父母和母亲,逐步向家庭语言渗透。他还指出,教育对语言保持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社会环境汉化,学校语文教育最终抵挡不住来自社会的压力。异族通婚对语言模式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的因素。语言转换和文化迁移不同步,语言选择和语言情感评价不一致,前者由人的社会发展和生存需求决定,后者由文化认同决定,这种不一致是自然的,不能把二者人为地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不能用情感评价去判断和评价语言转换行为,也不能根据语言转换行为强行要求情感评价必须与之同步。这些结论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三 重视改进田野调查方法

田野调查有多种方法,常用的有观察法、入户调查、访谈法、问卷法等。另外,玉柱还十分注意搜集当地有关部门统计资料、本土研究成果和各种档案材料。他认为,田野调查一定要按事先精心准备的大纲和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但是也要十分重视随机遇到的当地风俗人情、宗教仪式、婚礼葬礼和节庆假日活动,对民间收藏尤其要珍惜、爱护,并利用各种技术手段

设法采集。有些资料看似和研究目标无关,但日后有可能显现出巨大的学术文化价值,如果错过是很可惜的。

他还认为,田野调查应注意利用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应用。当今做田野不比往日,不仅有先进的电脑设备,还有录音、摄像、摄影、翻拍、专业软件等许多现代化技术手段。作者在田野调查中不仅录制了大量的长篇语料,还拍摄搜集到了许多民间收藏的文献和档案资料,有些资料甚至是文物级的。所以说,调查人员如果没有多方面的专业素质和信息敏感度,就会和许多宝贵资源擦肩而过。这是长期做田野调查的一个共同的体验。丰厚的第一手资料不仅能够充实研究工作,而且资料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产,如能传承,对后世研究将产生巨大影响。

应该重视田野日志的写作。田野日志是田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田野工作不仅要记录几千个词语、几百个句子,还要深入到语言使用者的社区,具体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仪式、节庆活动、婚礼丧葬、禁忌礼仪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田野日志不仅有利于检查督促工作进度,还有利于为主要数据提供背景材料。田野调查如果没有田野日志,原调查人员一旦离世,剩下的只是一套光杆数据,利用起来很不方便。玉柱将其田野日志列入著作附录中,其作用是:①有利于了解整个研究过程。整个研究工作上下延续整整25年,如果没有田野日志,读者就无从了解这一漫长而艰巨的探索过程。在这25年当中,目标区的社会变化是巨大的,日志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变化。②有利于核实作者调查资料的来源。很多长篇语料是当地百姓的口述,体现的是“文化主体话语权”,也就是说,都是当地少数民族对本地区许多文化历史现象的亲自观察和口述。这一点和调查者的研究不一样,尽管调查者的研究是对当地文化的理性考察和认识升华,但它毕竟是第二位的,是由外人作出的,它再好也不能代替群众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朴素认识。③田野日志中的部分资料被作者利用,它和正文部分可以互证,可以作正文部分的旁征、反证和背景交代。④该著作附录中的田野日志有十几万字,都是从蒙古语录音资料翻译过来的,将来连同音标转写、语义标注一同出版,就可以成为一部绝好的隔行对照文本,对语言本体研究有重要利用价值。

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夏季语言研究院相继开发了一系列语言田野调查

应用软件,《数据笔记本》就是其中之一。在该款软件中,用数据库的形式,将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做的田野日志形式化、程式化了。作者的田野日志思路在此与世界先进科技的发展方向接轨。他从英语翻译汉化整个田野调查软件包的操作指南等文献(300多万字),并为硕士生和博士生相继开设了田野调查新技术课程。这一举措,势必大大促进我们田野调查方法的更新和改进。

总之,我认为《蒙古语喀喇沁土语社会语言学研究》是一部有新意的著作,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有其闪光之处。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发表的题为《多角度、多方法才能深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国语言研究方法论刍议》的论文中提出:“深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要有多角度、多方法的宏观把握;必须辩证处理好‘近’和‘远’、‘大’和‘小’的关系;充分使用不同语言的‘反观法’;必须重视语言接触关系的研究;要深入语言生活做广泛、持久的田野调查。”看来,我与玉柱是想到一起了。

是为序。

2014年2月24日

于昆明

摘 要

本著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言”，包括课题研究的目的、研究现状及意义、课题的设计思路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观点和创新点等内容。

第二章“喀喇沁蒙古族源流及氏族构成”，从不同角度论证“喀喇沁”一词源于职业名称——北魏时期的宫廷宿卫“曷刺真”；“喀喇沁”作为部落和职业名称，主要来自元代的钦察军及哈刺赤户；“喀喇沁”作为独立、统一的部落，形成于明代；在清代，“喀喇沁”为蒙古部落名兼行政区域名称。

第三章为“赤峰市喀喇沁旗蒙古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社会调查及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喀喇沁旗蒙古族人口中，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者的比例不到0.6%。1921—1936年出生的70—85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从蒙古语向蒙古语和汉语双语过渡的时代，时值民国时期；1938—1950年出生的55—68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双语并用时代，时间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1951—1990年出生的17—55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转用汉语的时代。据推算，再过一代人，即30年左右，喀喇沁旗将不存在实质上使用蒙古族语言文字的人。

第四章为“赤峰市宁城县喀喇沁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社会调查及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宁城县的蒙古语已进入濒危阶段。在濒危语言（方言）区，家庭是母语激励源，社会是汉语激励源，社区人员的实际语言能力，一般情况下，接近两种语言使用机率的折中值。语言模式转换的一般过程是，首先是双语得到发展，纯蒙古语的使用受抑制，汉语使用逐步扩大；其次是蒙古语从社会交际领域退出，双语使用率下降，汉语使用率稳步上升；最后是完全转用汉语。语言模式转换的速度，城镇快于乡村，子女快于父母，干

部快于农民和学生。在濒危语言（方言）区，学校是母语、母文化保护的重要阵地，合并学校时，应分别对待，谨慎处理。

第五章为“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社会调查和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人口中蒙古语使用者占全县蒙古族总人口的 15.9%，真正的使用者不足 10%。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语言使用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从蒙古语单语过渡到蒙汉双语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初至 1979 年，再从蒙汉双语过渡到汉语单语模式。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在使用上已出现断代，成为濒危土语。

第六章为“喀喇沁部的地理分布及人口移动对民族接触和语言接触的影响”。“自然村地名数据库”数据显示：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接触和民族构成模式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而民族接触和民族构成模式是影响语言接触、语言转用过程和进度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平泉县移民开始早、规模大，蒙古族村落成为少数孤岛，在边缘孤岛中，蒙古语以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为依托，不同程度地得以保存和传承。喀喇沁旗移民开始早，但受土地所有权限制，形成蒙汉杂居模式，程度逐渐加深，兼用、转用彼此的语言成为自然选择，汉族人口逐渐占优势，汉语替代蒙古语的趋势开始形成。宁城县的移民开始早，由于有清廷的支持和专门开发机构，移民可以大规模地、独立地建村并开发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山林，居住模式是分离式的，蒙汉民族各保一方，杂居程度较低，蒙古族聚居村落较好地保存了蒙古语。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移民及其居住模式深受时局影响，在康熙之前蒙汉自然杂居，乾隆后汉族移民占优势，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一个调整过程，杂居程度加深，但不及喀喇沁旗。在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中，蒙古语保留程度比喀喇沁旗好，但不如宁城县。

“自然村地名数据库”数据还显示，喀喇沁地区蒙古语自然村地名按词义分类，可包括自然地理式、氏族人名式、职业分工式、聚落计户式四种类型。自然地理式村名显示喀喇沁人以山地聚落为主；氏族人名式村名显示喀喇沁部由众多氏族融合而成；职业分工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曾经有过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山林经营传统，农业及其他职业也逐步得到发展；聚落计户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初期的蒙古村落以 3、5、7、8 户为主，规模很

小。同名自然村名前加特定限定词,是自然村的横向扩展形式,以驻地核心村命名自然村上一级行政单位,是农村管理网络的纵向扩展形式。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汉化有音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音译、意译、两名并行、改名等不同过程。地名演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

第七章“喀喇沁地区蒙古族双语教育研究”认为,语言文字的使用深受国家制度的约束。特定语言在最大范围内的通行功能和国家政治权力相结合,便产生语言权威,体现在学校语言的选择及其安排顺序、国家对语言文字的规范上。语言文字教育与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政策运行机制有密切关系。此外,语言教育同人口比例、分布及其变动,同居民对语言教育的经济支撑能力,以及受教育者对社会发展的期望值等,都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第八章为“喀喇沁地区异族通婚对语言使用模式演变的影响”。异族通婚对语言模式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异族通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汉族母亲将汉语带进家庭,并影响子女家庭语言模式。异族通婚家庭语言模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社会语言环境,其中工作语言和邻里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蒙古语文教育对蒙古语的保持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社会环境的汉化趋势强劲,那么学校蒙古语文教育最终抵挡不住来自社会的压力。婚姻观和语言观演变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家庭中有异族通婚或异族通婚史,家庭成员在社会中多用汉语,一般会赞同或包容异族通婚、转用汉语。各种语言模式的家庭,不论有没有实践基础,都表示赞同使用双语,因为它是异族通婚家庭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言语表达策略。

第九章为“总结与理论探索”。个案研究总结可以概括为:

(一) 统一国家的建立和社会职业角色是氏族整合为部落的重要因素。

(二) 民族接触的程度取决于民族之间的接触方式、地理位置和移民模式。

(三) 土地所有权随民族间及民族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命系黄土者才真正守护那份土地。

(四) 人名、地名的汉化受语言演变和语言转用规律支配。

(五) 语言使用模式类型及语言转换阶段及速度。

喀喇沁地区蒙古族语言使用模式分保持型、转用型、双语型三类。双语型进一步分为蒙古语濒危型、蒙古语衰弱型和蒙古语下滑型。

从喀喇沁建旗到 21 世纪 30 年代,一共不到 400 年,前 300 年,蒙汉语经过长时间的接触,蒙古语渐渐丧失优势地位,后 100 年,蒙古语经过蒙古语单语、蒙汉双语,迅速过渡到汉语单语。在整个喀喇沁地区,由于蒙古语的社会使用出现断代,蒙古语的濒危趋势已形成。

(六) 影响语言转换速度的诸因素。

影响语言转换速度的关键因素是民族接触模式,尤其是居住模式。杂居程度深,兼用、转用彼此的语言是自然选择,随着汉族人口占优势,汉语替代蒙古语的趋势开始形成。居住模式是分离式的,杂居程度较低,蒙古族聚居村落较好地保存了蒙古语;喀喇沁地区蒙汉语言接触实践证明,影响并决定语言使用模式转换的关键因素首先不是使用者绝对人口的多寡,也不是使用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是居民社会中不同民族的居住模式和杂居、交往程度。一定人口规模的自然村是语言社会得以形成和保存的最基本的社会形态。

语言使用场域是影响语言使用模式转换的重要因素。在喀喇沁地区蒙汉杂居社区,家庭是母语激励源,社会是汉语激励源,社区人员的实际语言能力,在一般情况下,接近两种语言使用率的折中值。

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影响语用模式的转换。从语言模式转换的速度看,城镇快于乡村,子女快于父母,干部快于农民和学生。

职业对语言使用模式变化有一定影响。在喀喇沁地区蒙古族现时语言中,汉语使用程度最高的是干部,其次是家长,教师最低。

家庭语言中的年龄、等级和性别约束随场景发生变化。事实证明,现时语言使用模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语言环境,家庭语言随社会语言环境而发生变化。社会语言环境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父亲和晚辈语言应用模式上,然后波及祖父母和母亲,逐步向家庭语言渗透。

(七) 语言转换和文化迁移不等步,语言选择和语言情感评价不一致。

(八) 语言教育与语言转换。

语言文字教育与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政策运行机制有密切关系。语言文字的使用深受国家制度的约束。语言教育同人口比例、分布及其变动,同居民对语言教育的经济支撑能力,以及受教育者对社会发展的期望值等,都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本次研究发现,蒙古语文教育对蒙古语的保持和应用具

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社会环境的汉化趋势强劲，那么学校蒙古语文教育最终将抵挡不住来自社会的压力。

（九）异族通婚与语言转换。

异族通婚对语言模式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的因素。这一章还讨论了有关语言接触现象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Abstract

This book divided into nine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Introduction*, including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Previous Studi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ubject*, *Task Design and Work Frame*, *Methods of the Research*, and *Main Points and Innovations*.

Chapter two *Origins of Haraqin Mongolian and its Clan Structures* demonstrat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at “Haraqin” as a term comes from professional name of “Haraqin” —a garrison force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Haraqin” as a tribe name and career name, mainly comes from the Qin Chajun (a garrison force) and Haraqi in Yuan dynasty; “Haraqin” as an independent and unified tribe, was form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Qing dynasty, “Haraqin” became both the name of Mongolian tribe and the name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apter three is *Mongolian Language Appliance in Haraqin Banner Chifeng City*. The social survey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showed that in total number of Mongolian population in Haraqin, the ratio of people who using Mongolian language and writing is under 0.6%. People in 70 – 85 age group belongs to transition stage from Mongolian monolinguals to Mongolian and Chinese bilingualism, While people in 55 – 68 age group belongs to bilingualism. People in 17 – 55 age groups are Chinese monolinguals. According to calculating, after one generation, the users of Mongolian language and writing will be disappeared from Haraqin. The decisive factors influencing language switch are including political jurisdi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moving, education, intermarry and so on.

Chapter four is *Language Appliance of Haraqin Mongolian in Ningcheng County Chifeng City*. The social survey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showed that the Mongolian in Ningcheng County has already been in endangered status. In endan-

gered language area, family is a driver source of mother tongue, while society is that of Han Chinese, in most case,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local people approaches the intermediate of the two. The general process of language switching is that, firstly, bilingualism is developed, while the use of Mongolian is restrained and the use of Han Chinese is extended step by step. Secondly, the Mongolian retreats from language use of society, and bilingualism is declined, while the use of Han Chinese goes up steady. Finally, completes the switch to the Han Chinese. The pace of language change is that townspeople faster than local people, children faster than their parents, and cadres faster than farmers and students. In endangered language area, local school i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for protecting mother tongue and culture, so the merge of local school must be treated differently and seriously.

Chapter five is *Mongolian Language Appliance in East Haraqin Liaoning Province*. The social survey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showed that in total Mongolian population of East Haraqin, the users of the Mongolian account for 15.9%, the real users may be less than 10%. In East Haraqin, language mode had been changed from the Mongolian monolingual mode to the Mongolian and Han bilingual mode before the New China was founded; from 1949 to 1979, the Mongolian and Han bilingual mode further changed into Han monolingual mode. I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East Haraqin, the use of Mongolian has been stopped, and the Mongolian became an endangered dialect.

Chapter six is *An Impact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Immigration on National Contact and Ethnic Composition Mode in Haraqin Area*. The data from "Database of Natural Village Names" showed that, Immigration has a major impact on national contact and the ethnic composition model, and in Haraqin area, national contacts and national composition model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gres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switching process. In Pingquan County, large scale of immigration began early time of Qing, and Mongolian villages became a few islands, where Mongolians are preserved and inherited in some degrees because of the back up of these Mongolian villages. In Haraqin banner immigration also began earlier, but inhabited by Mongolian and Han with the restric-